学术专论

清前中期语言与世界语言学史

柳若梅

［摘要］明末清初天主教传教士入华推动了欧洲对中国的认识，伴随着欧洲学术的发展，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都进入欧洲的视野，清代语言在这一时期为欧洲语言学家所关注。清朝前中期的语言经由欧洲入华传教士和俄国入华商人带给欧洲学人，在世界语言学探索的道路上，留下了深刻的印记。而在俄国沙皇彼得一世将欧洲的科学和思想引入俄国之后，彼得堡科学院为欧洲的学人提供了“用武之地”，彼得堡也一度成为欧洲科学和文化成就的试验田，清朝前中期语言正是在这块试验田中进入了世界语言学研究的历史。

［关键词］语言　清朝　欧洲　俄国

［中图分类号］K24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8587（2015）－01－0052－09

在中外文化交往的历史上，随着明清之际欧洲传教士东来，中国与西方开始了大规模接触，特别是自耶稣会士入主清朝钦天监，直至雍正时期禁教之前，中西之间的持续交往已近百年。此间也是欧洲出现印刷术之后教育、科学和文化迅速发展的时期。语言是这一时期欧洲学人着力探索的重要对象。与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时期发展古典语文学思想相比，由于大量“新语言”的发现和欧洲文化的整体发展，17—18 世纪欧洲的语言学面临着概括新发现的语言资料、检验以往的语言理论、解决语言的起源和发展问题等任务。在这样的背景之下，清朝前中期的语言，经由欧洲入华传教士和俄国入华商人、学者带给欧洲学人，在世界语言学探索的道路上，留下了深刻的印记。而在俄国沙皇彼得一世将欧洲的科学和思想引入俄国之后，彼得堡科学院为欧洲的学人提供了“用武之地”，彼得堡也一度成为欧洲科学和文化成就的试验田。清朝前中期语言正是在这块试验田中进入了世界语言学研究的历史。

一、欧洲早期对中国语言的认知与当时的语言研究

中国语言在蒙元时期已为欧洲所知，当时出使蒙古的圣方济各会传教士所写的游记中提到“契丹国自有文字”以及中国的书法和印刷术。轰动欧洲的《马可波罗游记》也提到中国各省方言不同但文字相通。明代东来的葡萄牙人和西班牙人都曾记述中国语言在书面上体现为“字”而不是“字母”，并介绍汉字的书写特点和汉字的数量。明末即欧洲中世纪晚期，欧洲出现了综合欧洲所有

［收稿日期］2014－09－05

［作者简介］柳若梅（1966—），女，北京外国语大学全球史研究院教授，北京 100089；ruomeiliu@126. com

［基金项目］本文为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清代中西、中日文化关系史研究——以语言的交流互动为中心”（项目号 08JJD770090）的阶段性成果；本研究获北京外国语大学世界亚洲研究信息中心的资助。

中国信息于一书的《中华大帝国史》①，将汉字的样貌第一次呈现给欧洲，并介绍了汉语在发音、书写和字义等方面的特点。此后在中国长期生活的晚明传教士回到欧洲后，结合欧洲的语言研究介绍中国语言，曾德昭在《大中国志》② 中提到汉语的起源、语法特点、书写规律、汉字数量及构造等，并展现了更多的汉字。启蒙时代早期的欧洲学术界对中国语言愈加关注。

在北京生活已达 20 年（1648 年起）的葡萄牙耶稣会士安文思，为欧洲写出了“中国的十二个特点”，即从 12 个方面介绍中国文明，其中第三个方面即“中国的语言文字优美”，其中谈到，中国人在埃及人之前就有了文字记录，中国人使用的是54409个字，这些字表达他们要说的事，很优美、生动和有效。中国文字结构巧妙，表示与生活有关的图画和形象，并介绍了汉字的构成外形和规律，认为中国的语言文字发明得非常巧妙，并举例介绍汉字都是单音节，由 320 个单音节组成，通过读法上的差别和多种方式的复合，使得为数不多的单音节字非常丰富且富有表现力。③

1667 年，与多位在华耶稣会士有密切联系的欧洲重要学者基歇尔出版了《中国图说》一书，引起欧洲学术界的广泛关注。书中作者从读音、书写、字意及与埃及文字的比较等几个角度介绍中国文字，将大秦景教中国流行碑上的 1780 个汉字展现给读者，令欧洲学界叹为观止。

欧洲早期认识中国的时期，正值欧洲历史上中世纪晚期到文艺复兴这一段时期。中世纪欧洲的语言学虽然在材料的积累和理论完善方面乏善可陈。但欧洲中世纪出现了学校，学校中教授语言的方法，即将拉丁语作为人们训练逻辑思维的工具的做法，导致后来的学者认为，拉丁语法规则和概念具有普遍性，而习惯于将之机械地移植到其他语言的语法之中。语言规律的探索和印刷术的发明，使得在 16—17 世纪的欧洲，诞生了多种语言的语法书，如捷克语（1533 年）、德语（1534 年）、葡萄牙语（1536 年）、英语（1537 年）、匈牙利语（1539 年）、法语（1550 年）、波兰语（1568 年）、斯拉夫语（1584 年）、拉脱维亚语（1644 年）、丹麦语（1646 年）等。文艺复兴时期对古典语文学的重视使得东方的语言受到特别的关注，16 世纪初阿拉伯语和犹太语的语法书得以出版，其他东方语言如亚美尼亚语、波斯语、日语、朝鲜语的语法书也在这一时期出现。古典语文学中对宗教典籍的考订也促进了古代语文学的复兴，进入启蒙时期之后，东方语言更加受到关注。因而在古老东方中国的消息被源源不断地传往欧洲的同时，中国的语言也成为欧洲学者的关注目标。

二、彼得堡科学院院士拜耶尔笔下的汉满语与欧洲的语言研究

17 世纪末俄国沙皇彼得一世率团巡欧，将欧洲的实用科学和技术引入俄国，并与欧洲重要学者密切交往。1698 年至 1716 年间，彼得一世与注重人文精神的启蒙运动早期思想家莱布尼茨过从甚密，发展俄国的科学和艺术，一度是两人讨论的重要话题。④ 莱布尼茨认为，介于欧洲与东方之间的俄国，应当发挥沟通中国与欧洲的桥梁作用，将东方文明的成果介绍给欧洲。莱布尼茨去世后，彼得一世与继承了莱布尼茨思想的沃尔夫商议，筹建彼得堡科学院，并由沃尔夫向彼得堡科学院推荐学者。1720 年开始筹建的彼得堡科学院于 1724 年成立，聘自欧洲的大批来俄学者，将欧洲学术文化传递给俄国，同时，也将俄国的学术引入欧洲。1726 年，东普鲁士学者拜耶尔应聘彼得堡科学院的古代史院士席位。拜耶尔在彼得堡的中国语言研究，极大地丰富了欧洲

---

① 门多萨撰，何高济译：《中华大帝国史》，中华书局，1998 年，第 111—112 页。
② 曾德昭著，何高济译：《大中国志》，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 年，第 39—44。
③ 安文思著，何高济、李申译：《中国新史》，大象出版社，2004 年，第 43—45 页。
④ *Из истории Петербургской Академии наук*，Г. В. Лейбниц и Россия. СПб.：Европейский дом. 1999. стр. 9.

中国语言研究的内容。

拜耶尔的研究，体现了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者重视古典语言和文献、以从古典文化中寻找滋养当今文化成分的思想。当时的欧洲学界在整理研究古典文献（包括《圣经》）的同时，在对待语言的态度上，既重视当时欧洲学者通用的拉丁语，也重视其他民族的语言，并试图解读其他民族、特别是东方民族的语言。同当时欧洲的很多学者在考释宗教典籍的同时关注语言一样，拜耶尔也是圣经史研究的专家，因而拜耶尔所关注的中国，包括中国的信仰、崇拜方式等。拜耶尔是欧洲识别东方语言的重要学者之一，如科普特语等，就是经拜耶尔识别并确定的。在彼得堡科学院，诞生了拜耶尔的《中国博览》① ——欧洲第一部关于汉语的专著。

早在1713年，19岁的拜耶尔就接触到关于中国的资料，并对中国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开始自学汉语。1715—1717年间，拜耶尔在柏林皇家图书馆读到曾德昭的《大中国志》以及其他中国藏书和手稿，使他眼前的中国世界愈加丰富。1718年，拜耶尔发表了他第一篇关于汉语的文章《两本介绍汉语的书》②。在决定前往彼得堡受聘科学院院士时，他曾希望在俄国找到研究中国的新资料。来到俄国后，拜耶尔充分利用俄清直接接壤而独享陆路往来通道的条件（1728年中俄恰克图条约规定俄国定期向中国派出国家商队）。每逢商队人员回国，拜耶尔常常向他们询问关于中国的各式各样的问题，留心收集有关中国的信息、资料，设想编写出版一部汉语语法指南，再附上中国书籍的介绍和汉语词表。在1729年2月27日召开的科学院例行会议上，拜耶尔提出编纂出版《中国语法》的想法，经讨论确定该书完成后将出版1000册。这一决定马上得以实施，该书第一页小样儿便得以付印。③ 1730年，该书以《中国博览》为题问世，全书分为上下两卷。在前言中，作者总结此前欧洲积累的关于中国语言、文字、文学的信息；上卷则描述了汉语口语和书面语的语法框架、汉字的书写、印刷方式、中国人的辞令；下卷包括汉语—拉丁语的翻译，其中有一部分是由44个表格组成的、带拉丁文解释的汉语词表、皇室封号和中国的官职称谓，介绍了孔子及其儒家思想、中国度量衡、中国计算时间的方法，还描述了中国的日食。这部著作是一部集合了相关中国各类消息的书籍，也是欧洲第一部专论汉语的书籍。《中国博览》成为彼得堡科学院关注清代语言的起点，也在很大程度上丰富了欧洲关于清代中国语言的信息。该书问世后在欧洲学界反响强烈，其后的百余年间，反复出现欧洲的汉学家、语言学家的相关评论。书中全面地概述了当时欧洲对于汉语的认识和了解，反映了18世纪初欧洲语言学的总体水平，以及研究汉语的角度。19世纪俄国汉学的奠基人比丘林在其《汉语语法》④ 的前言中提到拜耶尔的这部著作时说："拜耶尔的可敬之处就在于，他关于语言机制的概念虽不全面，但却是相当正确的。"⑤

1730年，俄国新皇登基，清廷派内阁学士德新、侍读学士巴延泰为使臣，率团携礼赴俄祝贺⑥。1732年中国使团抵达俄都后得到热情接待，并被安排访问彼得堡科学院，参观科学院印刷厂、珍宝馆和实验室，拜耶尔作为科学院研究中国的院士接待了清朝使臣。他试着用汉语同他们

---

① *Museum Sinicum*, *in quo sinicae linguae et literaturae ratio explicatur*. SPb. : Acad. Petrop. 1730. N. 1—2.

② *Praeceptionum de lingua sinica duo libri*. Regiomonti, 1718.

③ С. К. Булич, *Очерк истории языкознания в России*. Т. 1. (18 в. —1825 г.). С приложением, вместо вступления,《Введения в изучение языка》Б. Дельбрюка. СПб., Типография М. Меркушева. 1904. Стр. 369.

④ *Китайская грамматика*, СПб., 1835.

⑤ 转引自 *Истотрия отечественного востоковедения*. М, 1990, стр. 81。

⑥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清代中俄关系档案史料选编》，第一编下册，中华书局，1981年，第541—543页、545—562页；尼古拉·班蒂什-卡缅斯基编著：《俄中两国外交文献汇编（1619—1792）》，商务印书馆，1982年，第229—232页；B. W. Maggs著，李约翰译：《十八世纪俄国文学中的中国》，台北：成文出版社1977年，第67—76页；俄国当时的报刊上也发表了此次中国使团访俄的情形。

交谈，向清朝使团秘书福卢请教科学院所藏中国图画的寓意①，并将《中国博览》赠给中国使团。

当时俄国最高枢密院成员奥斯德尔曼赞赏拜耶尔的《中国博览》，并因此允许拜耶尔进入他藏有汉语书籍和收藏品的私人图书馆，还帮助拜耶尔和俄国科学院的几位天文学家、历史学家同北京的耶稣会士建立起了通讯联系，并达成了互赠书籍和手稿抄本的约定。俄国科学院的院士们与生活在北京的耶稣会士的通讯，由拜耶尔开始，一直持续了 50 年。同北京耶稣会士的通信，不仅为俄国科学院的院士们提供了关于中国可靠的信息来源和学术观点，大大地开阔了他们的学术视野，而且还为他们各自的研究提供了宝贵的资料；同时他们同北京的三个耶稣会（法国耶稣会、意大利耶稣会和葡萄牙耶稣会）交换的书籍和手稿抄本，丰富了俄国科学院图书馆的资料，使俄国的学术界能够及时把握汉学研究的发展状况，为俄国汉学的建立迈出了扎实的第一步。拜耶尔与北京耶稣会士的通信，也促进了俄国学术界对中国语言的关注，关于中国语言的问题是他们谈论的主要话题之一。1732 年 9 月 12 日，在北京的耶稣会士戴进贤、徐懋德、严嘉乐收到拜耶尔托俄国商队带给他们的信函和《中国博览》后，在给拜耶尔的回信中介绍了汉语句法问题、中国人学写汉字的方法、汉语的特点等：

> 中文的句法是无法从词典中学到的，尤其是从那些传入欧洲的一些手抄本词典。词典《正字通》是一本很有水平的书，但它对“圣”字的解释甚为简略，既不足以涵括这个汉字的意义，也不能满足欧洲人的求知欲。这个汉字的崇高含义必须到别的中国出版的书中去找。中国人学写汉字的方法很适当：把一张透明的纸蒙在写得很漂亮的影格儿上，用毛笔照着影格儿上的字描。这样一直练到手学会协调地写出汉字的各个部分为止。印刷的书籍中汉字的形态在手写时几乎是不必理会的，这同我们的印刷体字母和手写体字母差不多。不过欧洲人应该知道，中国的汉字绝不能同世界上其他任何一种语言的字母相提并论。世界上其他语言的字母只是发音的符号，而汉字却不是发音的符号，而是思想、事物和活动的代表，或者说是象形的符号，对于这类符号应该适用扬比乔斯对埃及学家们讲的原则：“抓住它的意义，不必理睬它的语音形态。”因为具有相同意义的同样汉字，朝鲜人的读法就（同中国人）不同，日本人的读法也不同，印度支那人又不同。在中国内部，不同民族的人读法也不同。汉字的结构、分析、意义、和谐、结合和使用，以及汉字的言简意赅和内在的力量，这些学问不仅中国的学子们应该学，欧洲的学者尤其应该尽量多学。这种语文是如此之高雅，它就像浩瀚的大海，绝非涓涓溪流所能汲尽。②

拜耶尔收到回信后又（1733 年 11 月 15 日）给三人写信，请教中国词典《字汇》中的“圣”字以及“西狩”一词③，并希望能够得到西安出土的“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的碑文④。到拜耶尔的时代，“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在欧洲已不是新闻，可以推想拜耶尔读过碑文的译文。由于他对汉语感兴趣，所以希望得到汉语原文的愿望是可以理解的。严嘉乐在 1734 年 7 月 23 日给拜耶尔的回信中，回答了拜耶尔关于“西狩”的疑问，并表示西安的（景教）碑文不容易得到，也比较难翻译⑤，信中严嘉乐还附上了他从《资治通鉴》、《通鉴纲目》、《纲鉴补》、《品字笺》中抄录并做的注释，这是他认为的“圣”字较好的解释。拜耶尔回复严嘉乐信中（1735 年 1 月 6 日）指出，从景教碑文的第一行就可以看出，中国的景教碑文应该是从西徐亚文译成中文的，要解释景教碑文并不会太困难。拜耶尔作为教会史家同时有着丰富的东方古代语言知识，曾致力

---

① 严嘉乐著，丛林、李梅译：《中国来信》，大象出版社，2002 年，第 136 页。

② 《中国来信》，第 122—123 页。

③ 《中国来信》，第 126—127 页。

④ 耿昇：《外国学者对西安府大秦景教流行碑的研究》，《世界宗教研究》1999 年第 1 期。

⑤ 《中国来信》，第 129—130 页。

于西徐亚人研究（在彼得堡时发表过《西徐亚人的原始居所》、《西徐亚人时代就是希罗多德时代》、《论古代西徐亚人》等文章），因而认为有西徐亚文来源的景教碑文的解读并非难事，根据《品字笺》和《纲鉴补》解释“圣”字很有启发。拜耶尔在与宋君荣的通信中（1732 年 7 月 3 日）也了解到耶稣会士在中国语言学习与研究方面的成绩及北京耶稣会士与欧洲的学术沟通状况①，如马若瑟将其《中国语言札记》及其他关于中国的材料寄往欧洲、在北京的法国耶稣会士巴多明要编撰《拉汉词典》的想法②。1734 年拜耶尔收到了巴多明寄来的《拉汉词典》手稿③。

《中国博览》出版后，拜耶尔不满足于书中所附的简单词表。早在 1731 夏天，拜耶尔向出使中国的萨瓦—拉古津斯基借来北京耶稣会士巴多明编写的汉拉词典，自己做了抄本，后来他还利用奥斯捷尔曼私人藏书中的《字汇》、《海篇》等中国辞书，丰富他的汉语拉丁语词典的内容。④ 同在北京的俄国东正教使团随团学生，也为拜耶尔的词典做了不少工作。1734 年 11 月，拜耶尔在科学院例行会议上提出词典的出版问题，得到与会者的认同。但问题却出现在会议决定的实施阶段：出版这部词典需要刻出 1 万多个汉字木版。这在当时是很难实现的，词典的出版只好搁置下来。拜耶尔的汉拉词典手稿共 26 卷，在拜耶尔去世后存入科学院图书馆。1779 年科学院图书馆馆长巴克梅斯捷尔编的科学院书稿善本目录中，这套手稿遗失了两卷只剩下 24 卷⑤，到 20 世纪初时进入亚洲博物馆的科学院图书馆中，则只剩下了 23 卷，其第 9、10、12 卷阙如⑥，现存于俄罗斯科学院东方文献研究所图书馆。

同彼得堡科学院的其他学者一样，拜耶尔的研究成果不断出现在科学院的学术出版物《彼得堡科学院通讯》上，他关于中国语言的文章，也反映了欧洲和俄国学术界对清代中国语言的关注。1738 年，拜耶尔发表了题为《关于中国的字典〈字汇〉》⑦ 的长文，他的研究基于 3 个版本的《字汇》：曾参加恰克图条约谈判的萨瓦—拉古津斯基从中国带回的《字汇》、在华耶稣会士巴多明赠送的《字汇》以及奥斯捷尔曼个人所藏的《字汇》。文中拜耶尔详细全面地介绍《字汇》一书，包括汉字的书写、汉字构成规律、汉语字音、汉字注音、汉字声调、汉语词义等内容。

满语是清前期特别是正式场合使用的重要语言，当代满学学者有言，“在清入关后的前百余年，满族人使用满语，同时渐渐熟悉汉语。清朝皇帝恐满族人忘去本族语言，于是强调满语的重要性，强调‘国语骑射’（或说‘清文骑射’），凡录用官员、考试、京察、入伍、承袭世职等，都以满语为准；满语水平高的优先录用。……虽未规定汉族人必须学满语，但汉族人为应科举考试也必须学习满语，考取庶吉士必须考满语。”⑧ 满语是拜耶尔关注的目标，也是他与北京耶稣会士通信的话题，他还在 1722—1733 年间的科学院会议上宣读了他对满语的研究，这次发言以

---

① 《中国来信》，第 143 页。

② 《中国来信》，第 145 页。

③ 《中国来信》，第 201 页。

④ 见 Knud Lundbek，*T. S. Bayer*（1694—1738）*Pioneer Sinologist*，Curon Press，1986. 该书已由王丽虹完成中译并即将在大象出版社出版。

⑤ Бакмейстер， *Опыт о бибилотеки и кабинете редкостей и истории натуральной С. – ПетербургскойАкадемии наук*. СПб. 1779，стр. 58.

⑥ С. К. Булич，*Очерк истории языкознания в России*. Т. 1.（18 в. —1825 г.）. С приложением，вместо вступления，“Введения в изучение языка” Б. Дельбрюка. СПб.，Типография М. Меркушева. 1904. стр. 370.

⑦ De lexico sinico Cu gvey // *Commentarii Academiae Scientiarum imp.* Peropolitanae. Ad Annos 1732— 1733. SPb. 1738. T. 6. p. 339—364.

⑧ 爱新觉罗瀛生：《满语杂识》，学苑出版社，2004 年，第 958—959 页。

《关于满文》为题，于1738年发表于《科学院通讯》上①。拜耶尔关于满语和满语文献的文章，是满语首次在俄国出现的记录，也是欧洲关于满语的较早记录。后来中国俘虏在莫斯科教授满语以及俄国常驻北京的东正教使团成员的翻译和研究，丰富了俄国对满语、满文文献和满族文化的了解。以拜耶尔为中心的彼得堡科学院与清代中国之间的语言交流，为俄国积累了融入欧洲文化知识领域的资本，丰富了欧洲对中国语言的认识，也引领了18世纪俄国利用与中国相邻的先天便利进行科学的探索。

拜耶尔在彼得堡科学院对清代语言——汉语和满语的关注，体现了欧洲语言学研究的角度和方法，如在与在华耶稣会士通信中请教讨论的关于“圣”、“狩”等字、关于“西狩”一词等，都体现了当时欧洲语言研究的方式和希望从词源上了解汉语的研究立场。拜耶尔发表在彼得堡《科学院通讯》这个以欧洲通用的学术语言拉丁文出刊、为欧洲学术界所关注的期刊上的关于汉语和满语的文章，为欧洲语言学界提供了新的内容，丰富了欧洲的语言研究。

三、清代语言与世界语言学史上的语样收集

自14世纪但丁以意大利俗语写作的《神曲》拉开欧洲文化史上文艺复兴的帷幕，人们的思想模式也由“神本论”转向“人本论”，人文主义者主张平等相待各种语言，他们重视古典语言，关注东方语言特别是希伯来语、阿拉伯语和叙利亚语。到15世纪中叶欧洲知识界开始认识到语言的多样性，在文艺复兴中后期关于未来人类社会的想象中，“语言”成为一个必然涉及的方面。地理大发现使得知识界了解到的世界语言越来越多，发掘新语言的活动便一直持续进行。在16世纪欧洲开始出现把各种已知语言的样例结集成册的“语样集”。18世纪的俄国因其广阔的疆域而在“语言标本”采集方面独享便利，清代中国的语言也是其“语言标本”采集的对象之一。语言视野的扩大也使得语言与知识、语言与思想的联系在人们的头脑中越发紧密起来，这一点在俄国也体现得非常明显。同时，18世纪是俄罗斯民族文化崛起的重要阶段，当时俄罗斯文化，代表人物，大都对语言表现出独特的关注，如罗蒙诺索夫于1755年出版了《俄语语法》，1773年特列季科夫斯基出版了《外国人和俄国人关于古代和新时代正字法的谈话》，苏马罗科夫发表了《论俄语》的文章。

在不断认识新语言的过程中，欧洲知识界一度执着寻找世界各民族语言的共同来源，汉语、荷兰语、瑞典语等一度都成为关注的对象，直到一切语言源出于希伯来的臆说形成。欧洲启蒙运动早期思想家莱布尼茨从词源学研究、语言的亲属关系和分类的研究这两个方面回应这一臆说，他主张大量发掘收集未知的语言材料。18世纪的俄国地域广阔，民族众多，拥有丰富的语言资源。莱布尼茨收集新语言资料的建议对彼得一世影响很大。早在彼得堡科学院成立之前，在彼得一世的敕令之下，俄国便开始了西伯利亚考察活动，语言是一个重要的考察目标。1718年11月15日，彼得一世签发了在俄供职的德国学者梅塞尔施密特前往西伯利亚考察的敕令。考察活动历时7年（1720—1727），考察的地区是西伯利亚、达斡尔和蒙古，大量收集这些地区民族的历史、地理、人种学资料，这次考察留下了大量著作，并将日记、手稿文章、来自西伯利亚古墓的藏品带回了彼得堡。7年的时间使梅塞尔施密特学会了蒙古语和西夏语，收集了20种西伯利亚地区方言的语言学例证资料，其中的中国语言包括满语、蒙语、藏语等等，使彼得堡科学院拥有了专门采集的中国语言“标本”。

处于欧洲认识新种族和语言的热情之中的俄国，在彼得堡科学院，很多学者都对收集语言资料感兴趣，并从事带有语言研究性质的研究工作，在科学院组织的大规模的东方考察活动中收集

---

① De litteratura mangiurica // *Commentarii Academiae Scientiarum imp. Peropolitanae*. Ad Annos 1732—1733. SPb. 1738. T. 6. p. 325—338.

语样，所关注语言的辐射面遍及世界各民族。如前述受聘于彼得堡科学院古代史院士席位的拜耶尔，在科学院工作期间曾研究汉语、蒙古语、卡尔梅克语、满语、西夏语、藏语、梵语等。1730年起在彼得堡科学院工作的德国学者费舍尔，1739—1747 年间在西伯利亚考察 8 年，收集了当地各民族的语汇资料，编纂了词典（*Vocabularium continens trecenta vocabula triginta quaruor gentium maxima ex parte Sibericarum*），遗憾的是该词典未能出版。1767 年费舍尔将手稿赠给了哥廷根历史学院，现仍存于该处。德国学者陶别尔特供职于彼得堡科学院 1735 年成立的俄国词语收集室。他对于语言收集兴趣浓厚，在科学院期间编写了《拉法德俄词典》。对语言的关注也体现在历史学院士米勒（Г. Ф. Миллер, 1705—1783）在 1732—1743 年间的西伯利亚考察中，他收集突厥语和芬兰语资料，编辑出版了相关著述。米勒也是世界上第一部俄德词源学词典①的编者。米勒于 1750 年在彼得堡出版的考察成果《西伯利亚史》中,② 大量运用了其他学者翻译的东方文献，其中包括藏文、蒙文资料以及作为科学院翻译的罗索欣所译的中文和满文资料等。

科学院的中学督学巴克梅斯特，在清代语言传往 18 世纪俄国方面很有贡献。1773 年，巴克梅斯德发起了征集多语言语样的活动。他用拉丁语、俄语、法语、德语向各国学者发出倡议书，请求提供所接触到的各种语言的语样，包括古文献词汇注释和关于这种语言的介绍。巴克梅斯特还为在全俄进行学术考察的彼得堡科学院院士列涅希、帕拉斯、久尔登什德特提供了收集语样的详细计划和要求③，其中包括语样收集的样例，即取自拉丁文圣经中的一段话，配以这段话的阿拉伯语、法语、德语、俄语、瑞典语、芬兰语等译本。由于收集要求明晰，各语言的语样段落回收比较顺利。1784 年巴氏再次发出倡议书，并重新制作了语样例，此次为巴氏收集语言样例的有包括科学院院士在内的约 30 人，巴氏的收集目标为近 90 种语言，包括当时清代语言的语样收集，由在俄国东北考察的蒙特尔和在西伯利亚进行考察的帕拉斯分别收集。巴克梅斯特两次发出语样收集倡议，收回的大量语样资料为其同时代学者广为运用，也成为叶卡捷琳娜二世编纂出版的那部著名的全球各语言比较词典的基础。

叶卡捷琳娜二世在初来俄国学习俄语的过程中，便对编比较词典表现出兴趣，还曾邀请达尼尔 · 久马列斯克编比较词典,久马列斯克后来在英国出版了他编的大型词典《东方语言比较词典》（*Cmparative Vocabulary of the Eastern Languages*）。受法国语言学家库尔 · 德 · 热别连的影响，叶卡捷琳娜二世重视语言的族类划分，热衷于收集各种语言的样例。她先制定了一个计划：以 286 个俄语词作为根词，然后把这些根词译成能够找到的所有语言和俗语。1784 年叶卡捷琳娜二世下令将表格寄给俄国驻君士坦丁堡大使，以完成相应地区的语言调查和语样收集，要求不仅要以各地文字译出俄语根词，还要用俄语或拉丁语字母为其注音。叶卡捷琳娜二世没能坚持完成词典的编纂，而把收集到的所有材料转给了帕拉斯，希望他能够完成出版前的工作。帮助叶卡捷琳娜二世完成出版的，除帕拉斯外还有柏林的学者出版商弗里德里希 · 尼古拉(1804 年被聘为彼得堡科学院通讯院士)。帕拉斯接到叶卡捷琳娜二世收集到的资料和尼古拉的述评后，于1785 年发出一份特别公告，发布了词典将很快问世的消息。同时，他向俄国驻外的使臣、俄国国内外各领域学者，发出收集语样的新计划，其中包括女皇提出的俄语样词、样词的拉、法、德语样译。俄国各省长官都应该上报其辖下的语言信息，俄国派往各国的驻外使臣也必须上报所在国的语言信

---

① *Российская Целларусь, или этимологический российский лексикон, купно с прибовлением иностранных в российском языке во употребение принятых слов також с сокращенной российской этимологией, изданнный в Москве Франциском Гельтергофом, лектором немечкого языка московского униврерисuтет*а. 1771.

② Г. Ф. Миллер, *Описание Сибирскаго царства и всех произшедших в нем дел от начала, а особливо от покорения его Российской державе, по сии времена.* СПб. 1750. История Сибирь, в 3 т., М., 2005.

③ Idea et desideria de colligendis linguarum specimiuibns, СПб.., 1773. 见 С. К. Булич, *Очерк историиязыкознания в России.* Т. 1. (18 в. —1825 г.). С приложением, вместо вступления,《Введения в изучение языка》Б. Дельбрюка. СПб., Типография М. Меркушева. 1904. Стр.. 222—223.

息，收集语样计划发出的国家最远达到中国、巴西和北美（当时美国总统华盛顿发函请各州州长为俄国女皇的学术活动收集信息）。国内外语言信息纷至沓来。1787 年，以俄语和拉丁语编纂的词典以《敕令编写的各种语言比较词典》为名①，词典为两卷本，第一卷出版于 1787 年，收入欧洲和亚洲的 200 种语言。第一卷共收词 285 个。上册收入的词分为几类：第一个词为“上帝”（Бог）；第二个词是“天”（небо）；接着是表示人、人体部位的词，如“父亲、母亲、儿子、女儿”等，然后是表示人的喜怒哀乐抽象词，然后是自然现象名称、各种草和植物名称；下册是植物及其各部分名称、动物名称、各式武器名称、房屋及其各部分名称、日常生活中的种类物品名称、副词和形容词、述谓动词、代词。词典以俄语标出该样词在 200 种欧亚语言（149 种亚洲语言、51 种欧洲语言）中的音，其中第 135 种是蒙古语，第 163 种为满语，第 164 种为汉语，第 165 种是西夏语。这套词典的第一卷和第二卷都问世之后，后来又出版了第二版（四卷本），更名为《按字母排序的各语言比较词典》②，比第一版又增加了 4 种欧洲语言、22 种亚洲语言、30 种非洲语言和 23 种美洲语言。词典第二版按俄文字母顺序排列，正文分为三项，一是将不同语言的词的音列出，二是该音所对应的俄语词义，三是该音的词属何种语言。前后两次出版的俄国女皇叶卡捷琳娜二世的全球语言比较词典中都收入了清代的语言。

词典问世后，俄国女皇广泛赠与欧洲各国宫廷和学者，引起了世界各地学者的兴趣，一时成为当时学术界讨论的热点，活跃了当时的学术生活。很多著名学者都发表了相关评论，比较当时地球上的所有语言，并设想这些语言源于某一语源。词典涉及语种之丰富是前所未有的，特别是其中俄国、西伯利亚和亚洲的各种语言由此传达给欧洲，开阔了欧洲学术界的视野，并引发了 19 世纪初欧洲几种重要的词典的出版，如西班牙耶稣会士赫尔伐斯于 1800—1805 年在马德里出版的六卷本《已知各民族语言目录及其编号和各种语言和方言的分类》（*Catalogo de las lenguas de las naziones*），该书以收入多种美洲语言而著称，涉及美洲、亚洲、欧洲的语言近三百种，通过语法结构，再现各民族语言的亲属关系；再如阿德龙于 1806—1817 年间在柏林出版的四卷本《语言大全或普通语言学，附“主祷文”约五百种语言和方言的语样》（*Mithridates oder allgemeine Sprachenkunde mit dem“Vater Unser” als Sprachprobe in beynahe fünfhundert Sprachen bun Mundarten*）。而在俄国，这部词典问世所产生的影响，在此后语言学史上非常著名的词源探索活动中仍有体现。

结束语

彼得堡科学院利用俄国处于欧洲与中国之间的独特地理位置，吸收欧洲文艺复兴至启蒙运动时期的思想文化。在彼得堡科学院工作的拜耶尔，一方面将欧洲人文研究的重要方面——语言研究的观点方法带到俄国，另一方面利用俄国商队往来于中俄的机会，与在华天主教传教士建立联系，通过在华欧洲传教士和俄国商队代表，直接获取中国的语言资料，将研究成果广泛地公诸学界，使清代中国语言成为欧洲语言人文学者关注的重要对象。语样收集活动是世界语言学发展史上非常重要的一个阶段，尽管 20 世纪初以索绪尔为代表的普通语言学学派对中国语言的关注较少，但在 18 世纪世界语言研究领域，在语言学发展的历史上，清代的汉语和满语都已进入当时的语言学家的视野。18 世纪俄国的语样收集，将清代中国语言呈现于世界语言学界，为语言研究的历史比较方法提供了前提，也为形成于 19 世纪历史比较语言学奠定了基础，在世界语言学

---

① *Сравнительные словари всех языков и наречий, собранные десницею Всевысочайшей особы. Отделение первове, содержащее в себе Европейские и Азиатские языки.* СПб., 1787.

② *Сравнительный словарь всех языков и наречий по азбучному порядку расположенный.* 4 ч., СПб., 1790 — 1791.

的发展史上占有重要位置。

主要参考文献

[1] 爱新觉罗瀛生：《满语杂识》，北京：学苑出版社，2004 年。

[2] 尼古拉·班蒂什 - 卡缅斯基编著：《俄中两国外交文献汇编（1619—1792）》，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 年。

[3] 耿昇：《外国学者对西安府大秦景教流行碑的研究》，《世界宗教研究》1999 年第 1 期。

[4] B. W. Maggs 著，李约翰译：《十八世纪俄国文学中的中国》，台北：成文出版社，1977 年。

[5] 门多萨撰，何高济译：《中华大帝国史》，北京：中华书局，1998 年。

[6] 严嘉乐著，丛林、李梅译：《中国来信》，河南：大象出版社，2002 年。

[7] 曾德昭著，何高济译：《大中国志》，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 年。

[8]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清代中俄关系档案史料选编》，第一编下册，北京：中华书局，1981 年。

[9] Бакмейстер, И. Г. (1779). Опыт о библиотеке и кабинете редкостей и истории натуральной С. - Петербургской Академии наук. СПб.

[10] Bayer, T. S. (1738). “De lexico sinico Cu gvey”, *Commentarii Academiae Scientiarum imp. Peropolitanae*. T. 6. 1732— 1733 : cc. 339—364.

[11] Bayer, T. S. (1738). “De litteratura mangiurica”, *Commentarii Academiae Scientiarum imp. Peropolitanae*. T. 6. 1732— 1733: cc. 329—328.

[12] Булич, С. К. (1904). *Очерк истории языкознания в России*. Т. 1. (18 в. —1825 г.). С приложением, вместо вступления, “Введения в изучение языка ” Б. Дельбрюка. СПб. , Типография М. Меркушева.

[13] Сравнительные словари всех языков и наречий, собранные десницею Всевысочайшей особы. Отделение первое, содержащее в себе Европейские и Азиатские языки. СПб. , 1787.

[14] Из истории Петербургской Академии наук, Г. В. Лейбниц и Россия. СПб. : Европейский дом. 1999.

[15] Lundbaek, Knud (1986). *T. S. Bayer* (1694—1738) *Pioneer Sinologist*. London/Copenhagen: Curon Press.

[16] Миллер,Г. Ф. (2005). История Сибири. в 3 т. , Москва: Восточная литература.

Languages of Early and Middle Period in Qing Dynasty and History of World Linguistics

LIU Ruo-mei (Chinese Center of Overseas Sinology, Beijing Foreign Studies University; ruomeiliu@126. com)

During the late Ming and early Qing Dynasty, with the entry of Catholic missionaries Europeans gained a better understanding of China.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European academic research, China including its politics economics, culture were coming into the European's purview. Meanwhile, the languages of Qing Dynasty attracted the attention of European linguists in this period. The languages of the early and middle period of the Qing Dynasty the European missionaries and the Russian businessmen in china transmitted their knowledge to European scholars, leaving a deep imprint on the development of the world linguistics. After the Russian Tsar, Peter I, had introduced European science and thought into Russia, the St. Petersburg Academy of Sciences created a favorable environment for the European scholars. St. Petersburg also became the testing ground for European scientific and cultural achievements, where the languages of the early and middle period in Qing Dynasty entered the history of world linguistics in this period.